

# 关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问题的思考\* (上)

厦门大学 葛家澍 杜兴强

## 一、引言

在公司治理和委托代理关系中,在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分离的情况下,会计信息系统存在的基本理由在于,会计信息有助于降低投资者决策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借以减少决策风险、促使社会资源趋利性流动,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sup>①</sup>会计信息要发挥上述功效,必须具备相关性与可靠性。然而,相关性和可靠性往往需要权衡和协调(tradeoff)。事实上,尽管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颁布的SFAC No2中,相关性和可靠性被FASB并列为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首要属性<sup>②③</sup>,但当会计目标的定位从“受托责任观”上升为“决策有用观”<sup>④</sup>后,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的使用者导向(user-oriented)模式逐渐形成。在决策有用观下,由于所有者的模糊和高度分散性,使得财务报告信息的受托责任解除功能大大降低,而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时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则成为在既定环境下支配会计信息披露的因素,因此相关性就成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使用者对现行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模式的相关性的不满,由此而引发了一场财务报告改革的浪潮<sup>⑤</sup>,财务报告改革的焦点更多时候是集中于提高财务报告披露信息的决策相关性上。但一系列的上市公司财务欺诈案件迫使我们必须对可靠性问题保持应有的关注。本文旨在对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问题进行探讨,并尝试性地探讨提高相关性和可靠性的途径。

## 二、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主流观点及我们的切入点

### (一)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主流观点

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及其权衡问题,是现代会计理论领域内一个颇具魅力的论题,无论是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权威公告,还是学者的理论探讨,多年来都对该问题保持了密切的关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中,将相关性与可靠性作为会计信息的两个主要的质量特征被并提,但对两者的抉择讳莫若深。透过现象看本质,FASB更为侧重于“相关性”的意图其实一直十分明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进企业财务报告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改进企业财务报告的举措的着眼点几乎全是会计信息的相关性。AICPA的调查报告“improving Business Reporting: A Customer Focus”提出的诸多建议,如披露前瞻性的信息、披露资产和负债计量的不确

定性等明显地侧重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改进(AICPA,1994)。Wallman的观点甚至更为激进,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会计界对相关性的关注——在Wallman看来,相关性是会计信息最为重要的特征,为此他勾勒了一个包括五个层次的、彩色报告模式(Colorized Model):(1)相关性、可靠性、可定义性和可计量性均符合要求;(2)相关性、可计量性和可定义性都符合要求,但可靠性存在着疑问;(3)相关性与可计量性符合要求,但可定义性与可靠性存在着疑问;(4)相关性、可靠性和可计量性符合要求,但可定义性存在着疑问;(5)仅相关性符合标准,可靠性、可定义性和可计量性都不符合(Wallman,1996)。从上面五个层次的划分中,明确地可以解读出Wallman的基本思想,相关性是首要的、不可或缺的。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会计学会(AAA)大约每10年左右颁布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相关性都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加以阐述。英国《财务报告原则公告》指出<sup>⑥</sup>，“财务报表的信息必须相关和可靠,当两者互相排斥,需要对产生信息的方法选择时,所选择的方法应是能使信息相关性最大化的方法”——耐人寻味的是,ASB在10月份通过的“公告”内容的建议为,若可靠性与相关性互相排斥,有用的信息应有“那些可靠信息中最相关的项目”、“会计信息在符合可靠性之前,不应对外披露”<sup>⑦</sup>。

对于相关性和可靠性的权衡问题,有些文献提出根据财务报告的不同组成部分区分相关性和可靠性取舍的思路,即对于财务报表中的会计信息应该首先满足可靠性,甚至牺牲相关性;而对于其他财务报告,则强调相关性,甚至不惜牺牲可靠性。但是我们认为,按照这种“两分法”最终将导致一种尴尬的局面,那就是财务报表提供的是高度相关而又同时几乎不相关的会计信息,结果财务报表披露的会计信息很可能将失去其决策有用性。此外,这似乎与“FASB和SFAC No1 (Par.6)指出的结论——“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中心,是企业向外界传输会计信息的主要手段”相互矛盾。可见,“可靠性和相关性的内含及两者的辩证关系”仍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 (二)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交易费用引入后的一种新视角

会计信息是一种有价值的信息资源,管理当局是会计信息提供方主体,会计信息使用者是会计信息的需求方,会计信息对于供求双方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管理当局需要会计信息来解除受托

责任、供资源投入方评价其经营业绩,从而获取补偿方案规定的奖金或红利。会计信息使用者需要会计信息来减少决策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以达到改进决策获取收益的目的。但会计信息的供求需要花费资源和代价,管理当局提供会计信息需要花费簿记成本、支付代理人(会计人员)工资、培训费用等显性成本<sup>⑧</sup>,也要承担诸如诉讼成本、企业部分原本私有的信息公开后导致的竞争劣势等隐性成本<sup>⑨</sup>,还面临着会计信息披露对企业竞争力、谈判地位带来的不利影响<sup>⑩</sup>;会计信息使用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消化会计信息<sup>⑪</sup>。由于现代企业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A nexus of contracts),各类要素投入者作为缔约方并不直接参与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因此定期的会计信息披露就成为这些要素投入者了解企业情况和评价管理当局经营业绩,并据此作出各类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可以认为,会计信息的提供(包括质和量)是企业与各个要素投入者交易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那么提供会计信息而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就属于典型的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会计信息供求双方因会计信息而发生的各项成本,都可以统一于交易费用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因为会计信息的生产、提供和理解、分析、利用,都与企业的生产过程无关,因此属于交易费用<sup>⑫</sup>。

出于理性的考虑,每个会计信息的利益关联者都希望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实现个人决策效用的满意化。管理当局同样面临着一个私人决策的满意化问题,尽管管理当局披露会计信息是必须的,但他可以选择财务报告披露的会计信息的信息含量(Content)和时机,他所愿意提供的会计信息的水平和质量取决于私人边际收益和私人边际成本的比较和权衡。理想状况下,信息使用者同样也希望管理当局能够通过财务报告提供能够直接为他们所直接利用的会计信息,但财务报告的通用性使这种理想状况的存在性不具有普遍性。此外,通过私人契约,使用者也许可以直接得到与其决策相关程度最高的会计信息,但是成本——效益的约束往往阻止了使用者个人与管理当局之间私人契约的缔结,尤其当使用者个人在企业中拥有的权益份额较小时更是如此。这就促使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转而求其次,要求管理当局尽量在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的约束下提供通用的会计信息,而这些信息最起码应该满足基本的可靠性和通用的相关性。通用会计信息的提供导致使用者和企业管理当局之间围绕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的动态博弈。

1、企业私人边际角度的考虑。企业会计信息的提供并不是无成本的,实际上任何增加企业信息披露(包括披露的内容与质量)的要求都将增加企业的信息披露成本。信息披露成本分为两类,显性成本<sup>⑬</sup>和隐性成本<sup>⑭</sup>。那么,毫无疑问,出于理性的考虑,企业提供会计信息时,自身必然要进行成本——效益的权衡。<sup>⑮</sup>就特定企业而言,其愿意提供的会计信息的最佳点满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约束条件的 $q^0$ ,而提供会计信息也要受满足成本——收益的约束,从而提供会计信息的临界点 $L$ 肯定大于 $q_0$ 。那么:(1)若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那么企业将会提供更多的会计信息量,这可以理解为是企业自愿进行会计信息披露的一种动机;(2)若提供会计信息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那么假如缺乏外部强制力量,则企业不愿意提供更多的会计信息;(3)若提供会计信息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并存在外部管制、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那么企业将会遵循会计准则的要求提供会计信息。由于会计信息提供中存在成本效益的制约,再加上管理当局可能利用其拥有的信息优势损害投资者的利益,那么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就存在着外部性。

2、社会角度的总体考虑。在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上,企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既包括了所有者、管理当局和与企业直接有着明确契约关系的各个利益方,也包括了诸多潜在的投资者,企业提供会计信息质量可能促使这些潜在投资者所拥有的资源遵循趋利性流动原则而积聚于本企业。因此,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就天然地具备了外部性(externality)的特征<sup>⑯</sup>。外部性必须采纳各种方式予以内部化(internalization)。尽管企业提供会计信息带来的外部性因信息使用者和管理当局之间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外部性的存在将使得企业在会计信息提供中将不能只考虑私人成本、收益的对比,有时应该站在整个社会的立场上进行分析。此时,管制力量将会介入,希望能够借助于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的形式,矫正外部性产生的行为来确保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我们可以将与会计信息有关的全部利益集团假设为一个虚拟的企业合并体,那么外部性内部化问题就转化为使其联合社会效益(joint utility)最大化或社会联合成本最小化<sup>⑰</sup>:

$$JC(q) = AFC(q) + E(q) \cdot P(Elq)$$

其中, $JC(q)$ 代表社会联合成本, $AFC(q)$ 代表会计信息成本, $E(q)$ 代表外部性, $P(Elq)$ 是一个条件概率,代表既定会计信息质量给会计信息使用者带来损失的可能性。<sup>⑱</sup>可以肯定的是, $AFC(q)$ 是 $q$ 的增函数, $E(q)$ 、 $P(Elq)$ 是 $q$ 的减函数,因此 $JC(q)$ 一定是 $q$ 的严格凹(strictly convex)函数,那么必然存在一个极小值点(同时也是最小值点)。我们将位于该点的会计信息质量称为 $q^*$ 。从 $q \rightarrow q^*$ (即企业私人效用最佳点向社会效用最佳点的移动),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个社会效益(utility-improving)改进的过程。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出现的初衷,就是力图促使 $q \rightarrow q^*$ 的转变。透过会计发展史,我们可以从总体上看到,政府通过强制性的会计准则确实使早期会计信息公开披露实现了 $q \rightarrow q^*$ 的迁移,然而现实背景下,特定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在会计准则等规范形式下并不一定正好位于 $q^*$ 点之上!

原因在于: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等对会计信息进行管制和规范的形式,属于事前管制(ex anteregulation),所以通常具有一般性和通用性。但是,投资者根据会计信息进行的决策将面临不确定性,决策恰当与否将不仅既取决于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的质量,还与决策者个人的知识结构、偏好以及决策模型和面临的决策环境相关。另外注意到,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达到其应有的质量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事后(ex post)验证行为、依存于投资者的主观判断——若投资者根据会计信息进行决策的结果是不利的,那么投资者完全有可能指责会计信息的质量。投资者更愿意相信的逻辑是,既然要与投资者的决策相关,那么如果根据会计信息进行决策后的结果是不利的,那么会计信息提供的质量不高。当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给相当多的投资者决策带来不利结果时,企业将面临事后的惩罚。而这凸现出目前关于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争议的一个焦点:到底投资者的损失是因为会计信息缺乏相关性或可靠

性而导致的,还是因为投资者不当地分析财务报告而导致。因为按照FASB的SFAC No1,财务报告提供的会计信息对那些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且相当勤勉、并愿意分析财务报告的使用者而言是有用的。

#### 注释: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02JAZ790012)及福建省社科基金(2003B084)的阶段性成果。

①杜兴强:《会计信息的产权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FASB的SFAC No2(Par.34)中明确指出:“会计信息不同质量特征的相对权重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区分质量特征的层次性只是作为解释的手段,目的是澄清(概念之间)一定的关系”。

③可靠性与相关性矛盾(有时体现为两者组成要素之间的矛盾)的情况在财务会计中屡见不鲜,比如过分强调及时性,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程度就会削弱;而强调可验证性,相关性也会有所损失。

④从“受托责任”概念内涵的变迁过程来看,最初的受托责任是单一的、一一对应的,体现为中世纪庄园管家对主人交付财产的管理;随后受托责任演变为职业经理对资源投入者交付资源的保值和增值责任,此时受托责任依然存在着明确的、数额确定的委托方,这保证了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私人契约的可行性;以后,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使得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高度分离,所有权细分的结果造成了每个所有者所拥有的所有权份额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此时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作为评价企业管理当局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作用已经降低,更重要的体现为一种决策效用。小股东往往将追求定期的股利收益放在第一位,一旦他们不能够获得预期的股利收益,他们往往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即以“市场退出”的方式来对管理当局进行“惩罚”,而并不希冀撤换、控制或监督管理当局。

⑤AICPA, “Improving Business Reporting — A Custom Focus”, 1994; Wallman, 1996.6, “The Future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Part II: The Colorized Approach”, Accounting Horizons.

⑥ASB,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1999.12.

⑦现在ASB公布的原则公告发表时间是1999年12月,比10月公告迟两个月,但其中蕴涵着几处变化。

⑧会计信息提供的显性成本指处理和提供会计信息的成本,除了正文中所列的各项成本外,还包括审计成本、传输信息成本、回复对已经披露的会计信息进行质询的成本。

⑨隐性成本是指或有成本或者不能够准确地进行确定的成本。会计信息披露并不一定引发诉讼成本,但不能排除因使用者指责会计信息的误导性而引起的诉讼费、立案费和结案费及企业在诉讼中面临的潜在声誉损失;竞争劣势导致的隐性成本因企业不当披露有关技术和管理创新的信息、战略计划、经营信息而引发。

⑩AICPA, “Improving Business Reporting: A Custom Focus”, 1994.

⑪由于财务报告上提供的会计信息一般来说具有通用性,

FASB在SFAC No1中曾指出过这一点。此外,SFAC No1(Par36)指出,编制财务报告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对于那些于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合理程度的知识,而又愿意用一定的精力去研究信息的人士,是可以理解的和有用的。

⑫包括交易费用学派的创始人科斯在内的经济学家虽然广泛引用交易费用概念进行相关研究,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没有任何人对交易费用给出完善、可操作的定义。阿罗(Arrow)将“交易费用”界定为“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按照我们的理解,自从康芒斯(1950, Chapter 3)将“交易”界定为“人与人之间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人与人之间权利关系”之后,“交易费用”其实就在微观领域内获得了与“生产成本”相对应的地位,即生产成本是指“生产出产品所需要的费用”,而交易费用是指“完成交易所需要的费用”。具体到会计信息问题,我们认为一切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而发生的各项费用,都属于交易费用的范畴。

⑬Watts and Zimmerman, 1986,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Prentice-Hall Press; AICPA, “Improving Business Reporting—A Custom Focus”, 1994.

⑭尽管会计上并不考虑隐性成本,但毫无疑问企业管理当局在进行决策时类似的隐性成本却是必须考虑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既定的会计准则和契约法定要求的约束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是由管理当局来决定的。

⑮参考了杜兴强,《会计信息的产权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杜兴强,《会计信息产权:一个新视角》,《财会通讯》2002年第2期。

⑯既然提供会计信息只是企业与要素投入者交易的一部分,而交易的真正目的在于促使资源以各种方式流入本企业,那么会计信息的提供就存在一个收益——成本的权衡问题。换言之,提供会计信息的目的要到效益最大化。而使提供会计信息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为“使提供会计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提供会计信息的边际效益”。

⑰关于“外部性”一个经典的定义是:设有A、B双方,他们分别在X、Y的水平上进行某些活动,A的行为可有对B产生影响,并假设双方的净效用可以用货币进行度量,那么双方效用分别为: $U=A(X)$ ;  $V=B(Y)-S(X,Y)$ ,当A不对B进行补偿时, $A(X)$ 、 $B(Y)$ 代表双方行为不存在影响时的效用函数。如果A不对B进行补偿,那么此时外部性就等于 $S(X,Y)$ 。

⑱社会效用存在着难以进行测度的问题,所以我们进一步转换,将社会联合效用最大化转换为社会联合(jointcost)成本最小化。

⑲会计信息提供的高质量充其量只是会计信息使用者正确决策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使用者的决策正确与否除了受会计信息质量制约外,还受一些环境因素和个人禀赋、知识结构差异的制约。反之,即使使用者进行决策后的实际结果并非损失,但也并不能够据此断定会计信息的高质量。应该肯定的是,惟有因会计信息质量因素而带来最终的实际损失才能够称之为会计信息的外部性。

(编辑 李泽国)